

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 演化及影响

余纲正 景嘉伊

内容提要 2010 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两波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浪潮，而社交媒体在这之中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从以“社交”为动力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升级为以“场景”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社交媒体传播工具实现了从单纯建立人际联结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的智能化和视频化转向；青年和意见领袖相结合成为参与主体，同时女性在性别鸿沟加剧的逆境中持续发声的努力也更加凸显；舆论场中的民间、官方和国际社会三方呈现出割裂与碰撞并存的局面，而信息战攻防强度升级与平台“武器化”的新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撕裂对立的风险。考虑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垄断及信息流操纵，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以更加全面和审慎的态度看待媒介技术赋权。在利用社交媒体更快发现和掌握自身社会治理问题的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应当加大关键平台的建设力度并提高其管理水平，掌握舆论情势引导的自主权，以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

关键词 中东剧变 阿拉伯国家 社会运动 社交媒体 传播技术 媒介环境

作者简介 余纲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084）；景嘉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从 2010 年底开始，一波剧烈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社交媒体也因其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密集关注。自 2018 年初以来，新一轮社会运动又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此起彼伏般涌现，更加常态化和多元化的线上线下互动模式不仅成为不少当地民众表达不

满与寻求政治改变的一种主要参与途径，也再一次把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紧密联系但又不断发展的关系呈现在世人眼前。

纵观2010~2012年和2018~2020年两波浪潮，我们可以发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连接和宣传，在催化和动员线下街头抗议行动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持续而深刻地改变着阿拉伯民众的社会参与机制。相较于十年前，如今阿拉伯国家抗议者和政府双方斗争意愿不减，目标更加明确，方式愈发成熟。特别是伴随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经大众传播形成的拟态环境中话语权的争夺更为激烈，成为现实空间里权力博弈的生动反映。^①

十年前那场阿拉伯剧变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受到过一部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关于最近这波社会运动的不少观察还主要停留在描述层面，同时对于这十年来社交媒体在阿拉伯社会运动中总体演化规律的研究与反思更是有限。基于此，本文选取社交媒体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其与阿拉伯世界社会运动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对2010~2012年案例的重新审视以及2018~2020年新案例的剖析解读，以期在数字媒介时代更好地理解中东社会治理的状态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

一 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基本关系

辨析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基本概念，厘清中东特定环境下两者互动关系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是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特征、演化及影响的关键前提。“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一系列基于第二代互联网（Web 2.0）技术的互联网应用服务。^②它能够使用户在有限系统内创建公开或半公开个人描述，进而与相关用户形成共享圈，并在圈层内实现内容的自由创造和交换。社交媒体的关键特征是参与、公开、互动、社区化、链

^① Marwan Muasher, “Is This the Arab Spring 2.0?”,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0/30/is-this-arab-spring-2.0-pub-80220>, 2020-09-09.

^② “Web 1.0”和“Web 2.0”在使用模式上大致是“只读不写”和“既读又写”的区别，需要注意的是其与“个人电脑（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因为后两者更关注的是某一阶段中重点使用的具体工具。“Web 1.0”时代没有智能手机的概念，只有承担通话和简短信息收发的移动电话；而在“Web 2.0”时代也用个人计算机（PC）终端，但智能手机的特征更强烈。另外，目前对于“Web 3.0”只有概念上的探讨，但普遍认为人类社会还并没有达到这一阶段。

接和超链接集聚。^① 在这种基本共性之下，国际知名社交媒体平台经常还具有部分差异化竞争的特点，如“推特”（Twitter）主打以微博客形式呈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热烈讨论”；而“脸书”（Facebook）则倡导通过构建社交关系网去“联系朋友和家人，发挥社区力量，让世界更加紧密”。^②

“社会运动”指的是有众多个体参与的、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群体政治行为，其核心要素包括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或系列性的价值表达及公开展示。^③ 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运动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共鸣性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促使公众对强大对手发起持续性的集体挑战。^④ 其在历史上有诸如环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很多情况下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但也有可能转化为暴力的革命运动。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针对社会运动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各类探讨，整体上形成了以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为代表的两大范式，尽管各有偏重，但普遍认同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综合造成。^⑤ 其中，代表性的加值理论（Value-added Theory）将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行动系统性地归结为结构性诱因、结构性压迫、概化信念的产生和传播、戏剧化的触发事件、参与者的动员能力以及社会控制程度的降低。^⑥

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开创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Theory），特别注重技术话语对人与社会共栖关系的改变，提出了“传播的时空偏向”“媒介即人的延伸”和“媒介即隐喻”等重要论断，开辟了结构与互动关系视野下的后现代传播研究路径。通过这种分析视角进行观察，可以发现18世纪印刷技术和报刊对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以及20世纪广播和电视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推动，而这些无不显示出媒介变革促成社会转型的巨

① 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载《编辑之友》2015年第5期，第5~10页。

② <https://about.twitter.com>, 2020-09-10; <https://about.fb.com>, 2020-09-10.

③ 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美国]查尔斯·蒂利著：《社会运动1768-2004》，胡卫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4页和第9页。

④ [美国]西德尼·塔罗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和第6页。

⑤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66~70页。

⑥ Neil J.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Y: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p. 13-17.

大能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勃兴,更是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之既有形式,形成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和“一种多重面向的虚拟文化。”^①在2009年以前,有个别学者关注到少数几个国家的民众初步尝试将新信息技术整合到社会运动中的成败案例,其中比较经典的有关注移动电话和短信服务在2001年菲律宾抗议时任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中的联结作用,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及由此形成的公共讨论空间对2002年韩国总统选举的突出影响,互联网接入率与二级意见领袖对民众参与2004年乌克兰所谓“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动员效果,以及2007年缅甸军政府为阻止所谓“番红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所采取的断网封锁等行为。^②

尽管社交媒体的雏形在第一代互联网(Web 1.0)时代就已出现,但当时的发展模式还是以门户网站为主,所以并未对大众传播业态造成全球性的颠覆性冲击。随着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互联网时代到来,特别是得益于奥巴马成功利用“推特”组织竞选活动并最终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学界关于新技术是否正催生政治参与类型转变的讨论才真正被激发。^③2009年发生了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运动事件,即二十国集团峰会背景下爆发的伦敦万人游行,摩尔多瓦反对派不满该国议会选举结果而进行的街头示威,以及伊朗改革派支持者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三场社会运动的共性是开始较为普遍将社交媒体作为参与者信息分享、情感共鸣和行动支持的重要渠道,真正将当时的“‘推特’革命”这一技术驱动型概念推向前台。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剧变更是为学者们提供了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丰富素材,有关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关系的探讨也得以更加深入。

① [美国]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② Howard Rheingold, “Mobile media and Political Collective Action”, in James E. Katz,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 MIT: The MIT Press, 2008, pp. 225-239; Mary Joyce, *The Citizen Journalism Website “OhmyNews” and the 2002 South Kor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bridge: 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Law School, 2007; Joshua Goldstein, *The Role of Digital Networked Technologies in the Ukrainian Orange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Law School, 2007; Mridul Chowdhury,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Burma’s Saffron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Law School, 2008.

③ John H. Parmelee and Shannon L. Bichard, *Politics and the Twitter Revolution: How Tweets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Public*,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1, p. 8.

一方面，一些学者积极肯定媒介技术嵌入社会运动生态中的作用，尽管他们对社交媒体所发挥具体功能的关注点并不完全一致。有学者从范式上指出，相较于2010年以前的认知框架，阿拉伯剧变的新形势要求研究者超越将社交媒体单纯当作信息分发和组织渠道的简单看法，而要在互动关系中增强对三方面新特征的关注，即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如何代表运动生态中的交互网络机制，如何嵌入或被嵌入到不同类型的把关（Gatekeeping）^① 进程，以及如何反映了所处环境的动态变化。伊娃·贝林（Eva Bellin）聚焦社交媒体的属性特征，认为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匿名性、自发性、同步性和扁平化优势，成功地填补了威权国家中的公民舆论空白，使运动的爆发成为可能。^② 有学者则进一步讨论了线上线下联结的转化条件，提出社交媒体导致的用户聚集并非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相反，它通过舆论领袖软性地设置讨论场景、形成情感场域，引导高度分散和个性化的个体集合，从而发挥了“集合”与“编排”公共空间的主要作用。^③ 在影响机制上，马克·林奇（Marc Lynch）总结了社交媒体对阿拉伯政权形成挑战的四种具体途径，包括激发集体行动、限制或强化政权的压迫机制、影响国际社会对政权的既有支持以及对公共空间的长远形塑。^④ 具体到实践操作层面，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抗议运动不同阶段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利用社交媒体的反抗准备阶段、国家控制下的导火索事件爆发阶段、数字化联结的街头抗议阶段、国际社会介入阶段、诉求达成或失败的高潮阶段以及长期僵持的后续信息战阶段。^⑤

① “把关”概念指的是在群体传播时，信息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在这些渠道中，存在一些“把关人”（Gatekeeper），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Alexandra Segerberg and W. Lance Bennett,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 14, No. 3, 2011, pp. 197 – 215. 上述作者认为，即使“推特”看起来是信息流自由流动、所有链接都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究竟哪些更能引起大众关注在本质上还是取决于例如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媒体等把关人来筛选。

② Eva Bellin, “Reconsidering the Robustnes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Lessons from the Arab Spr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4, No. 2, 2012, pp. 127 – 149.

③ Paolo Gerbaudo,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p. 5.

④ Marc Lynch, “After Egypt: The Limits and Promise of Online Challenges to the Authoritarian Arab Stat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9, No. 2, 2011, pp. 301 – 310.

⑤ Philip N. Howard and Muzammil M. Hussain, *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6.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则提出社交媒体在运动中的作用有限，应警惕对其功效的过分夸大。这类研究者们一般都认可将社交媒体作为宏观社会结构下的触发和推动因素，但认为其只能作为工具帮助反抗者对行动进行优化，而不能作为根本原因决定民众是否采取行动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其中。这种观点的产生源于四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社交媒体的自身局限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推特”的“关注”和“脸书”的“好友”关系模式，是建立在以陌生人或泛泛之交（Acquaintances）为主的“弱连接”逻辑之上。这对于获取创新想法、分享信息和提升参与率具有显著作用，但无法支撑高度风险、需要精细策略和严明纪律的行动主义，因为后者更多依赖具有共享经验和日常紧密接触的“强连接”，从而导致社交媒体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效果有限。^① 其二是使用对象的局限性。数字鸿沟指的是技术接入拥有者和缺乏者之间的差距。有学者提出，社交媒体在降低行动者的合作成本时，也排斥了无力掌握新式工具的大量人群。^② 当熟练使用社交媒体的反对派在互联网上形成意见气候后，不谙此道但意见相左的人群则倾向于保持沉默并最终形成所谓“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所以虚拟空间是否能真实全面反映民意仍有待评估。^③ 其三是政府层面同步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尝试平息抗议，可能极大地抵消反抗者对社交媒体的创新运用效果，而这也是在运动初期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正吸取此前本国或他国政权对危机应对不当的经验教训，在意识和手段双重层面实现强化升级，以期不仅能有效回应抗议行动，更能利用新技术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④ 这说明社交媒体并不会永远只

① 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October 4, 2010.

② 韦路、张明新：《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4期，第43～53页；[美国]查尔斯·蒂利著：《社会运动1768-2004》，胡卫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35页。

③ Keith Hampton, Lee Rainie, Weixu Lu, Maria Dwyer, Inyoung Shin and Kristen Purcell, “Social Media and the ‘Spiral of Silence’”,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4/08/26/social-media-and-the-spiral-of-silence>, 2020-09-10.

④ Sean Aday, Henry Farrell, Marc Lynch, John Sides and Deen Freelon, *New Media and Conflict After the Arab Spring*,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2; Steven Heydemann, *Upgrading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World*, Washington: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7; Larry Diamond, “Why Are There No Arab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1, 2010, pp. 93-104.

对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单方面有利。^① 其四是对网络社会运动持久性的质疑。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Evgeny Morozov) 认为社交媒体催生了“感觉良好但又毫无社会政治影响的网络行动主义”，使得很多人只愿线上声援而不付出实际行动，而旁观力量并不足以激发实质变革。^② 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提出，经由网络传播的虚拟承诺只具备当下冲击力和短暂影响力，由于抗议者并未找到媒介工具和抗议获得成果的持续联系，社交媒体仍只是运动发生的有效但非充分条件。^③

回顾上述研究与既有讨论，为全面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了对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功能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分析，一方面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及其在技术层面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避免将媒介仅仅视为操作工具的单一技术思路，而应该在宏观环境中关注技术、内容、生产者、消费者和应用结果的互动关联。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可以划出定义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三个关键维度：包括基础设施网络和个人设备在内的“工具”——它们用于承载和传播数字信息；包括个体、组织和产业在内的“人”——这是生产和消费数字内容的主体；人通过工具所呈现和传达出的“内容”——即数字化的个人信息、新闻、观点和文化产品。^④ 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工具—人—内容”的三重分析维度，审视近十年两场阿拉伯社会运动浪潮中社交媒体的特征、演化及影响。

二 2010 ~ 2012 年阿拉伯剧变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及特征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年轻的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Mohamed Bouazizi) 因抗议警察执法而选择在街边自焚，引发该国大规模街头示威活动。民众抗议浪潮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和传递，迅速波及北非和西亚其他国家，

^①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1, 2011, pp. 28 - 41.

^② Evgeny Morozov,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lacktivism”, *Th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09/05/19/the-brave-new-world-of-slacktivism>, 2020 - 09 - 11.

^③ Carola Richter, “Virtual mobilization: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Egypt”, *Orient I*, 2010, pp. 18 - 27; Taylor Dewey and Juliane Kaden,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Social Unrest in the Arab Spring*,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12.

^④ Philip N. Howard and Malcolm R. Parks,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Change: Capacity, Constraint, and Consequ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2, No. 2, 2012, pp. 359 - 362.

深刻重塑了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格局。社会运动直接导致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和萨利赫等政治强人及其威权政府多米诺骨牌般倒台，亦推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逐步深陷内战和混乱的旋涡之中。这一时期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特征，与阿拉伯世界初步进入第二代互联网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第二代互联网代表的技术架构和应用工具变革，突破了第一代互联网对人与内容之间关系的限制，强调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深化。作为本质上的用户参与架构，刚进入第二代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既是个体吸收整合社会能量的接收器，也是个体能量放大为社会能量的转换器，因而重新构建了社会联结的生态体系。^①

（一）工具：互联网接入率提升与媒介管控背景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

从近代尤其是二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环境变动无不与媒介化的公共领域拓展紧密相关。^②“九一一”事件之后，伴随美国面向中东的公共外交手段升级，同时也得益于诸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等域内媒体的崛起，阿拉伯民众所处的信息环境更加丰富，由此对政权主导下的国内媒介态势造成了直接挑战。整体而言，受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媒介特点限制，此时的阿拉伯世界传播渠道仍由政府出资把持，单向度宣传、过滤和监管严重，这种现象直到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2010年社会运动浪潮来临之前的众多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转型尚未充分，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和宗派主义、威权主义盛行的政治文化以及传统生产方式导致全国性横向经济联系与社会互动网络的相对缺失，造就了公民社会的长期缺位。^③在这种背景下，“网络赋权”这一概念有了落地实践的可能，即社会中有机会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人，通过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实践性互动过程，试图改变个人不利处境、提升能力或权力，从而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现状。^④新兴媒体技术作为“弱者的武器”，对于社会地位相

^① 彭兰：《Web 2.0 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第44～48页。

^② Saba Bebawi, “A Shift in Media Power: The Mediated Public Sphere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 Saba Bebawi and Diana Bossio, *Social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Reportage: The “Arab Spring”*,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23.

^③ 田文林：《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第47～52页。

^④ 梁颀、刘华：《互联网赋权研究：进程与问题》，载《东南传播》2013年第4期，第14～17页。

对低下、社会权力获取有限的中下阶层调和多种制度性缺失与个人基本生存需求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①

2010~2012年这场阿拉伯剧变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据迪拜政府学院（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的数据统计，截至运动爆发前的2010年底，阿拉伯世界“脸书”总用户数逾2100万，相较于年初的不足1200万增长了超过78%，其中15岁至29岁的青年群体占到用户总数的75%。^②在阿拉伯各国中，埃及用户最多，占比高达22%。各国的用户普及率从0.08%至45.48%不等且差值明显，其中以海湾国家最高，索马里、也门和苏丹居于后三位，地区平均水平为6.77%。这一数据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持续上涨，截至2012年6月，该地区“脸书”用户数扩增至4500万，各国平均使用率约12%，均较一年半前增长一倍左右。同时，阿拉伯世界“推特”的活跃用户达到近210万人，其中在2012年3月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用户发布了约1.7亿条推文，即平均每一秒都有67条信息更新。^③网络赋权的强化直接带来了阿拉伯民众公共话语权前所未有的提升，其传播模式的草根化和分散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与民粹主义倡导的解构权威、平民化和大众化等理念相契合，共同推动互联网成为群众集体行动的新社会语境和权力场域，最终通过聚焦效应作用于政治变革的发生。

（二）人：以青年和意见领袖为核心的“另类新闻”勃兴

2010~2012年阿拉伯剧变参与人群构成的一大特征是有大量作为内容生产和消费主体的“U世代”（Generation U）青年。“U世代”指的是30岁以下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Underutilized）的和被低估（Underestimated）的青年穆斯林。^④一些研究显示，对经济生存条件的不满是该群体当时参与运动的首要原因，对政府腐败、政

^① 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第124~145页。

^②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rab Social Media Report: Facebook Usage, Factors and Analysis*, Dubai, 2011.

^③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in the Arab World: Influencing Societal and Cultural Change*, Dubai, 2012.

^④ Robin Wright, *Rock the Casbah: Rage and Rebellion Across the Islamic World*,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p. 91.

治民主自由的诉求反而相对较低。^① 在2010年之前的25年间,阿拉伯世界始终是世界青年人口占比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每年约有280万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青年膨胀”现象突出。2010年,该区域15至24岁青年人数近7000万,平均失业率却高达23.7%,远超13%的世界平均水平。^② 在突尼斯、埃及和约旦,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口失业率也达15%。^③ 与祖辈相比,在新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阿拉伯青年一代中,不少人深受全球化和世俗化影响,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通过新媒体与全球信息产生联系的媒介素养更强,通过网络自我赋权以改变僵化现状的动力也愈发强烈。^④

参与人群的另一大特征是少数意见领袖的杠杆撬动功能。根据二级传播理论(Two-step-flow Theory),以知识和意见等为形式的大众传媒“信息流”并不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总倾向于先抵达“意见领袖”这一中间环节,再经人际传播传递给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进而形成不同信息位阶用户间“影响流”的分布。经过意见领袖二次加工的信息往往针对性更强,具备超越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改变他人态度的能力。^⑤ 尽管一般网络媒体研究更注重将信息生成看作是跨越不同组织背景、个人身份特征、地理位置等差异的去中心化扁平协作,但事实上,处于新旧媒体革新交界处的2010~2012年阿拉伯剧变仍延续了极强的层级传播色彩,并具有明显的议程设置属性:身处抗议现场的西方记者和使用英语的本土激进人士作为一级意见领袖,面向消息灵通、关注中东的专业人士传递现场信息;二级领袖随后将经筛选的过滤内容呈现给当地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最终形成一般性受众对事件的认知。^⑥ 在此过程中,普通参与者通过“推特”转发他人发布的信息、使用话题标签参与

① Mark R. Beissinger, Amaney A. Jamal and Kevin Mazur, “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 Regime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8, No. 1, 2015, pp. 1-24.

② The World Bank, “Unemployment, Youth Total”,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UEM.1524.ZS?end=2020&locations=ZQ&start=1991&view=chart>, 2020-09-12.

③ Nader Kabbani, *Youth Employ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visiting and Reframing the Challenge*, Brookings, 2019.

④ 吕耀军、狄芮:《论阿拉伯新青年的崛起及其社会参与》,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88~109页。

⑤ [美国] 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黑兹尔·高德特著:《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第8~19页。

⑥ Marc Lynch, “After Egypt: The Limits and Promise of Online Challenges to the Authoritarian Arab Stat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9, No. 2, 2011, pp. 301-310.

社区讨论、浏览算法推荐的热门话题，经由社会网联结反复扩大一级意见领袖的信息或观点，最终形成基于共同兴趣的“信息瀑布”，影响更多外围用户横向的级联追随。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运动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引领账号类型可分为传统主流媒体（@AJEnglish @nytimes）、非媒体类官方机构（@Vodafone @Wikileaks）、记者（@AndersonCooper）、激进人士（@Ghonim）、政治家（@Diego_Arria @JeanMarcAyrault）、网络名人（@TimOReilly @Alyssa_Milano）以及专家学者（@JRICole）等。^①

“U世代”青年和处于信息高阶的意见领袖的双重联合，在技术工具的支持下最终带来了“另类新闻”（或被称为“替代性新闻”）在阿拉伯世界的大范围勃兴。另类新闻是相对于主流媒体的去资本化、去专业化和去制度化新闻实践，在内容上多关注不被主流报道的边缘群体或事件，在组织形态上侧重公民在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能动作用，充分体现了“人人都可以是记者”的人文特征，为原本备受压制的公众言论表达和知情权获取提供了更多可能。^②但是，信息生产在从机构把关过渡为自我纠偏的同时，也暗含着因个体理性有限而带来的失衡和被操控威胁，出现了大量激化群体对立与阶层仇视的极端话语与表达。

（三）内容：舆论场中三方的割裂与碰撞

第一，社会运动参与者对线上舆论场的建构大多与运动进程紧密相连，体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关注。作为描述推文内容和辅助信息搜索的关键词，“推特”的政治性话题标签具有围绕特定话题汇集信息和组建社群的快速集聚作用，能够较好反映用户关注点的变动趋势。这一功能在2007年圣地亚哥森林大火救援中首次被发掘，并在2009年伊朗选举抗议中被广泛应用。^③2010~2012年阿拉伯剧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标签包含以关注或声援国家革命进程为代表的“突尼斯话题”（#Tunisia）、“埃及话题”（#Egypt）、“利比亚话题”（#Libya）、“巴林话题”（#Bahrain）等，以传递聚集信息为代表

^① Gilad lotan, Erhardt Graeff, Mike Gaffney, Ian Pearce and Danah Boyd, “The Revolutions Were Tweeted: Information Flows During the 2011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 2011, pp. 1375 - 1405.

^② Chris Atton and James F. Hamilton, *Alternative Jour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pp. 117 - 135.

^③ Tamara A. Small, “What the Hashtag? A Content Analysis of Canadian Politics on Twitt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14, No. 6, 2011, pp. 872 - 895.

的“一·二五话题”（#Jan25），以反映特定诉求为代表的“政权倒台话题”（#Fall of Regime）、“人权话题”（#Human Rights）、“西迪布济德话题”（#Sidibouزيد）等。以“埃及话题”为例，2011年1月23日至11月30日，共有约748万条推文使用该标签，在穆巴拉克辞职当天数量达20万，多数为本地用户使用阿拉伯语书写，体现了公众对本国公共事务关注的高度自觉和自主。而包含“利比亚话题”的527万条推文中，大部分由关注中东局势的境外用户通过英语发布，二者差异背后反映的地区局势和心理诉求仍值得进一步探讨。^①除此之外，运用政治幽默和讽刺手法的表情包、海报、口号、图标和旗帜等也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制作和广泛传播。^②这些都反映出使用者不同的民族主义情感取向、对当前政策的不满与问责，以及呼吁生活改善和上层社会变革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

第二，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于新工具的认识严重不足，比较单纯地试图借助简单技术策略或暴力镇压，拒绝与反抗者对话，导致新型舆论场上官方回应内容方面几乎空白。通常来说，执政者更有机会利用完善的国家传媒系统进行政策宣导，而反对派则对新式传播方法更加敏感和依赖。^③在2010~2012年阿拉伯剧变中，因为缺乏面对线上线下民意汹涌而来的成熟经验，多数政权起初简单粗暴地干涉社交媒体信息流动，以应对冲击政权稳定的外来挑战，常见方法包括：过滤和监视负面信息、追踪互联网协议（IP）地址、惩罚异见者、实行内容审查制度、出台网络犯罪法和新闻管控法、屏蔽代理服务器，以及维持大规模情报机构和军事安保组织等。不过，阿拉伯国家对互联网进行物理管控的力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当地年轻人对国际社交媒体的实际使用率，这很可能与青年用户突破防火墙的技术能力有关。^④因此，考虑到高昂的技术和社会成本，再加上一些政府发现自身在当时所具有的手段

^① Axel Bruns, Tim Highfield and Jean Burgess, “The Arab Spring and Social Media Audiences: English and Arabic Twitter Users and Their Network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7, No. 7, 2013, pp. 871–898.

^② Belqes Al-Sowaidi, Felix Banda and Arwa Mansour, “Doing Politics in the Recent Arab Uprisings: Towards a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Arab Spring Slogan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0, No. 5, 2015, pp. 1–25.

^③ 赵民、张军锋：《社会运动中的Twitter现象——兼论Twitter的性质与发展方向》，载《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第34~44页。

^④ D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rab Social Media Report: Facebook Usage, Factors and Analysis*, Dubai, 2011.

在网络舆情的管控上其实往往很难奏效，所以逐步对使用频率和强度有所节制，但是在内容引导方面仍然常常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第三，国际社会的介入导致舆论场更加多元混乱。根据对一些阿拉伯国家抗议中的推文分析显示，大量信息发布者为境外用户，他们通过“推特”面向世界进行关键信息扩散，而非参与到实际的当地抗议组织工作中去。^① 以外部视角分析，一方面，运动“扩散—同化”动态机制引发了域内其他国家的关注，如半岛电视台对抗议活动持续跟进、同样渴求变革的他国民众声援某国反抗者等；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刻意干扰，试图通过国家性的话语系统将抗议活动引导到其长期宣扬的西式民主化运动轨道。^② 据此，一些学者指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剧变是西方又一次离岸主导的成功案例，其过程中出现的号召公民进行非暴力抗议、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发挥媒体的中心作用等手段与颜色革命别无二致。^③ 例如，自2009年起，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USAID）和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对埃及部分工会组织提供持续性的资金资助，标榜“捍卫工人权利，弘扬法治理念，架起埃及民众和劳工运动的桥梁”。这批工会通过建立和经营“脸书”主页迅速获得大批追随者与同情者，并有组织地发起了一系列线下活动，实际上成为2011年埃及更大规模街头行动的预演。^④ 相比起一般性的政治宣传，西方国家在网络舆论场上的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蔽性和操控性，不仅放大了阿拉伯民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情绪，人为制造内部对立，更挤压了本土文化的发展空间，引起部分青年和国家精英的思想混乱，进而加剧了运动后的社会失衡和崩溃可能，为西方依据自身意愿改造并控制阿拉伯世界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① Robert Brym, Melissa Godbout, Andreas Hoffbauer, Gabe Menard and Tony Huiquan Zhang, “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5, No. 2, 2014, pp. 266 – 292.

② 例如，近年来，欧美国家加大对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干预，努力推介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政治文化，详见章远：《后“伊斯兰国”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宗教困境——兼论西方推行世俗政治秩序的危险》，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第72~74页。

③ [法国]埃里克·德纳塞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8~20页。

④ Erin A. Snider and David M. Faris, “The Arab Spring: U. 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Egypt”,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https://mepc.org/arab-spring-us-democracy-promotion-egypt>, 2020-09-08.

⑤ 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第15~19页。

三 2018~2020年阿拉伯社会运动中 社交媒体的演化及影响

从2018年初起,新一波社会运动再次席卷阿拉伯多国。围绕失业问题、物价上涨、税收政策和官员腐败等传统主题,抗议浪潮从摩洛哥、突尼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及蔓延至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活动进入2020年仍在延续且又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因在爆发原因、涉及范围、作用方式和影响结果等方面与上一轮社会运动浪潮存在相似性,该系列抗议被不少西方媒体冠以所谓的“新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之春2.0”之称。^①

相较于阿拉伯剧变仍大体上处于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第二波阿拉伯社会运动则已完全升级进入成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因直接作用于2010~2012年阿拉伯剧变、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大型政治事件,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社会参与能力被广泛关注。在迈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传统社交媒体日益暴露在假新闻、用户隐私泄露和算法操控等问题质疑之下,市场份额也被诸如“照片墙”(Instagram)、“快拍”(Snapchat)以及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际版”(TikTok)等更加年轻化的垂直细分平台撼动,关于其未来走向的担忧不断涌现。时逢新旧十年之交的历史关头,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和“5G”等为代表的技术更新再度引发了信息生产和分发的全流程变革,平台与用户间、用户彼此间建立有效连接更加复杂和困难。在此媒介背景下观察阿拉伯世界的新一轮社会运动浪潮,仍可发现在“工具—人—内容”三个向度上的相应变化。

(一) 工具:移动设备智能化与视频化的传播转向

如果说2010~2012年那场阿拉伯剧变仍可视作发生在以“社交”概念为

^① Jeremy Bowen, “Is A New Arab Spring Unfolding in the Middle East?”,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50219821>, 2020-09-09; Matt McGarry and Conor Finnegan, “‘Arab Spring 2.0’: What to Know about the Protests Roiling Iraq,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 *ABC News*,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arab-spring-20-protests-roiling-iraq-lebanon-middle/story?id=66740013>, 2020-09-09; Nick Paton Walsh, “‘Arab Spring 2.0’ is A Reboot Full of Bugs”, *CNN*, <https://www.cnn.com/2019/04/13/middleeast/npw-arab-spring-sudan-analysis-intl/index.html>, 2020-09-09.

根本动力的个人电脑互联时代，那么 2018 ~ 2020 年这第二波社会运动浪潮则毋庸置疑应被视为诞生在以“场景”感知和信息适配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① 据最新统计显示，阿拉伯世界已有近 1.8 亿互联网使用者，这个数字较 2010 年增长了 350%，已经占目前地区总人口数的 70%。^② 该地区目前社交媒体普及率约为 44%，90% 的阿拉伯青年每天至少选择一种平台登入。其中，作为区域内访问量最大的社交应用，“脸书”用户数接近 1.3 亿，实现了十年间 520% 的高速增长，并成为近半数青年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从 2013 年起，“推特”在阿拉伯地区的使用率有所下降，目前维持在 22% 的占比规模。但是，它在本地区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仍不容小觑，如沙特就是该平台的全球第五大使用国。“优兔”（YouTube）在中东地区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为家庭主妇和千禧一代，后者占比近 60%，在埃及甚至高达 77%，尤其在 2019 年斋月期间，该平台上的电视剧收视率增长可达 150%。^③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标准，在使用方式上，2019 年阿拉伯地区智能手机持有者达 1.74 亿，约 60% 的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上网，91% 的用户能够享受“3G”及更高水平的通信技术服务；预计到 2025 年，阿拉伯世界将实现“4G”用户覆盖率达 52%，公众通过移动终端接入社交媒体的增势将更加明显。^④ 智能手机的大面积普及，加上这类设备在拍摄像素和储存容量等方面的性能提升，使大规模的视频拍摄、传输和接收成为可能。

具体而言，借助移动工具的智能化和（短）视频化趋势，社交媒体在新一波社会运动浪潮中相较之前更加主要地凸显发挥了三方面作用。第一是更全面的实况记录。在苏丹，虽然巴希尔政府对不少站点和软件进行了屏蔽，但该国抗议者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将大量军警暴力对付和平示威的视频上传至“脸书”上一个名为“讲经坛聊天”（Minbar Chat）的群组。在国家电视台和报纸集体失声之时，这一系列视频成为外界社会了解巴希尔

① 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载《新闻记者》2015 年第 3 期，第 20 ~ 27 页。

② Internet World Stats, “Usage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5.htm>, 2020-09-14.

③ Damian Radcliffe and Hadil Abuhmaid, *Social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2019 in Review*, University of Oregon, 2019.

④ Statista, “Smartphone Market in MENA”,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5338/smartphone-market-in-mena>, 2020-09-14;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19*, Geneva: ITU, 2019.

政权对抗议者进行打压的重要标志和证据。^① 第二是更细腻的情绪传递。因不满统治者将游行爆发原因归咎于西方煽动,黎巴嫩抗议者在“推特”上发起草根征集活动,号召民众匿名录制“我是黎巴嫩人,我为革命提供资金”的视频并接龙上传,以政治讽刺呼吁政府正视社会变革的内生需求。第三是更巧妙的监管规避。例如,伊拉克抗议者巧妙地避开了禁止媒体报道游行的行政规定,通过“脸书”直播、基于高精度定位的“快拍”的交互热力图等功能,全程跟进示威进程。^② 新时期的社交媒体产品以满足用户更高的情感需求为核心,以视频化的虚实场景交叠体验为主要手段,借助移动工具、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等技术功能的发展,不仅在平台与用户间形成了更为深刻的交互关联,也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进行与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操作可能。

(二) 人: 性别鸿沟与女性作用

女性的地位与权利在最近几十年来愈发成为阿拉伯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之一。事实上,阿拉伯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和参与国内政治的斗争,先后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民族独立浪潮、现代国家建立、伊斯兰复兴运动、全球化外部冲击以及中东剧变等多个历史阶段,呈现出迭进反复、波浪式前行的发展特点。^③ 这一议题已在部分国家逐步渗透到公共生活和法律法规制定中,促进了对既有宗教实践的反思和新知识的传播。

长期以来,阿拉伯地区的抗议活动以男性参与为主导,2010~2012年阿拉伯剧变中女性尝试发挥更多的协同作用,但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结构和宗教激进主义者的阻碍,往往被要求走在游行队伍的末尾,甚至不被允许加入。风波过后,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宗教力量的上升,不少地方穆斯林女性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在埃及、伊拉克、沙特、叙利亚和也门的境况尤为艰难。^④ 2019年,阿拉伯国家的男性互联网平均普及率达58.5%,女性仅为44.2%,相较于2013年反而扩大了5.2%的鸿沟,阿拉伯世界也成为全球互

^① Salam Ahmed, “Blog from Sudan; The Sudan Uprisings; The Revolution of the Youth”, CHR and Michelsen Institute, <https://www.cmi.no/publications/7201-blog-from-sudan-the-sudan-uprisings-the-revolution-of-the-youth>, 2020-09-15.

^② Emmanuelle Saliba, “Protests in Iraq Find an Outlet to the WorldSnapchat”, *NBC News*, <https://www.euronews.com/2019/10/26/protests-iraq-find-outlet-world-snapchat-n1072266>, 2020-09-17.

^③ 吕耀军、张红娟:《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流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2~120页。

^④ Karrie Kehoe, “Factbox - Women’s Rights in the Arab World”,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https://news.trust.org/item/20131111115632-hn9t2/?source=spotlight-writaw>, 2020-09-18.

联网性别使用差异最显著的地区。^①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不少女性没有放弃，而是利用社交媒体持续努力争取登上阿拉伯社会运动的主舞台。以也门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塔瓦库·卡曼（Tawakkol Karman）、巴林社会活动家宰奈卜·哈瓦贾（Zainab al-Khawaja）等为代表的女性领导面孔出现，触发了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女性的权利觉醒。她们积极通过新媒体技术自我赋权，在双重革命的压力下，一边同男性一道反抗传统政治权威，一边对抗社会的性别禁锢，参与群体也从知识精英阶层扩大到普通大众。因此，在第二波社会运动浪潮中经常可以看到女性领导游行队伍，这也充分反映出开始争夺舆论话语权的“90后”乃至“95后”阿拉伯青年人更加自由开放的精神。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场景”的理解和对新工具技术模式的运用使女性在发声方面获得了一定优势。在阿尔及利亚，由女性领导的民间机构成为抗议组织核心。她们举着“没有性别平等就没有民主”的标语参与游行，并制作成视频进行快速传播，通过抵制保守教派的性别攻击、游说立法改革以及动员社会文化革新等不同方式，尝试冲击和弱化极端宗教主义在本国的影响。在2019年国际妇女节当天，阿尔及利亚女性示威者的人数更是达到顶峰。^② 在约旦，组织社会运动的年轻人用社交媒体的各类新功能宣传女性参与其中为自己发声的重要意义，试图说服公众线下活动是安全的，以此鼓励更多人走上街头。^③ 如今更加多元的社交媒体中的匿名性特征，能够使女性相对自由和安全地沟通交流。^④ 这类现象可以被视为阿拉伯世界一种特殊的“反公共性”共享空间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逐步实现对既有性别隔阂与话语分层的超越。

（三）内容：社交媒体“武器化”与信息战攻防升级

在智能媒体时代信息过载和受众有限注意力的博弈压力下，如何在社交

^①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19*, Geneva: ITU, 2019.

^② Aili Mari Tripp, “Beyond Islamist Extremism: Women and the Algerian Uprisings of 2019”, CHR and Michelsen Institute, <https://www.cmi.no/publications/6983-beyond-islamist-extremism-women-and-the-algerian-uprisings-of-2019>, 2020-09-20.

^③ Taylor Luck, “Jordan’s Young Protesters Say They Learned from Arab Spring Mistake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8/0605/Jordan-s-young-protesters-say-they-learned-from-Arab-Spring-mistakes>, 2020-09-21.

^④ Einar Thorsen and Chindu Sreedharan, “End Male Guardianship: Women’s Rights, 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1, No. 5, 2019, pp. 1 121-1 140.

媒体上快速引发爆点、规模“刷屏”、提升流量、进而影响甚至操控公众舆论成为数字资本争夺的首要目标。^①这一模式从商业消费领域外溢到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竞争中，推动斗争各方将承载着信息技术的新媒体朝着日益“武器化”的方向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假新闻和后真相情绪传播等主要路径，社交媒体愈发成为发动网络暴力和激发新型冲突的主要工具，最终服务于爆发在数字领域的激烈信息争夺。

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源于恐怖组织在阿拉伯剧变之后的动员实践。借助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全球拓展，“伊斯兰国”突破了传统战场暴力冲突的局限。从人员招募到战事报道等各个方面，恐怖组织通过强化“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叙事激发仇恨、雇佣“推特”机器人水军歪曲事实、炒作组织形象以及加密社群网络构建人员生态，不仅增加了现实中冲突爆发的可能，也将反恐作战范围从线下扩大至线上。^②虽然“伊斯兰国”本身遭到打击和唾弃，但它设计的社交媒体战术更易突破传统的屏蔽、断网和人身控制等手段，所以一些相关技巧和思路也被各国各派势力广泛应用在政治实践中。^③据统计，2019年全球共70个国家的政党或政治家有明确的社交媒体操纵活动，这一数据相较2017年增长了150%。有证据显示共56个国家曾在“脸书”运用算法、自动化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议程设置。其中，80%以上的国家通过购买真人水军账户或虚假机器人账户进行宣传，7%的国家曾经直接用黑客攻击或盗窃账号。对“推特”的相关研究也证明，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在所有类别信息中均快于真实新闻，而其中虚假的政治新闻所造成的传播效果更是遥遥领先于自然灾害、科学技术、都市见闻或金融消息等其他高频关注领域。^④正是基于该类操作策略在政治竞争中的巨大能量，有资料显示，在巴林、埃及、卡塔尔、沙特、苏丹、叙利亚和阿联酋7个阿拉伯国家中，应对社会运动除采用传统手段，在大量视频和标签“刷屏”容易造成信息过载的

① 史安斌、王沛楠：《2020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话题的访谈》，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3期，第24~32页。

② Emerson T. Brooking and P. W. Singer, “War Goes Viral: How Social Media is being Weaponized Across the World”,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11/war-goes-viral/501125>, 2020-09-22.

③ Samantha Bradshaw and Philip N. Howard, *The Global Disinformation Order: 2019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s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Oxford: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19.

④ 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and Sinan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Vol. 359, No. 6380, 2018, pp. 1146-1151.

新背景下，政府还发挥自身优势或联合支持者群体，采用大量反向内容攻击诋毁对手等手段来进行社交媒体的信息管控。

为了应对这种现象，社交媒体平台方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试图避免自身成为“武器化”和信息战的第一个牺牲品。在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社会运动的抗议高潮期间，“脸书”以涉及“虚假信息散播”为由，关闭了阿联酋和埃及的259个账号、102个页面、5个群组和4个话题，以及下属的17个“照片墙”账号。同年9月，因涉嫌国家控制或恐怖主义资助，“推特”禁用了4500个来自阿联酋、埃及和沙特的账号，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同时在列。与此同时，多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也对政府的内容信息战展开反制，一些示威者坚持在同一阵地上抵制信息干扰、分享自豪时刻和纪念死者。比如，阿尔及利亚技术爱好者发起了清除“电子苍蝇”活动，旨在消解政府雇佣的机器人水军使用大量负面内容对抗议活动的破坏——该类账号往往具有创建时间短、好友人数不足100、重复回复相同信息等特征。除此之外，一些所谓公民自建的“假新闻核查”页面也开始上线，即使其动机和实际效果尚未有定论。^①但从总体上而言，社交媒体的“武器化”和各方信息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舆论场的对抗升级，叠加上阿拉伯世界固有的宗教、种族和文化等根源性冲突，进一步造成了很多群体间的对立，舆论极化后果明显，社会有被进一步被分化甚至撕裂的风险。

四 结语

自阿拉伯剧变爆发十年来，阿拉伯联盟的多个成员国都发生过政府倒台、政权更迭乃至残酷内战。曾经憧憬的“春天”并未到来，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危机反而呈上升之态，地区局势在深刻转型与激烈动荡中更显错综复杂。^②这给政治学领域和地区研究方向的学者带来了诸多充满挑战性的课题。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与现实社会互动关系也日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关注领域之一。发生在2010~2012年以及2018~2020年的两波阿拉伯社会运动，既为分析传播技术、媒介环境和社会运动互动关系提供了经典案例，也为全面理解阿拉

^① Marco Silva, “Algeria Protests; How Disinformation Spread on Social Media”,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blogs-trending-49679634>, 2020-09-23.

^② 王林聪：《当前中东局势新变化及其影响》，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110~115页。

伯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跨学科视角，所以梳理和审视这十年来两场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特征、演化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媒介技术进步的视角充分理解社交媒体的工具特征和环境属性，认知它为公共话语空间承担起的公众意见传导器、社会情绪催化器和动员组织辅助器等功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克服将媒介仅仅视为操作工具的单一技术思路，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并不是唯一力量。只有通过观察社交媒体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面向影响因素的互动关联，才能更加宏观地把握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关系，也更加准确地判断不同社会运动之间共性和差异。

因此，本文在借鉴大量经典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工具—人—内容”的三重分析维度，对201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两波大规模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最近十年在从以“社交”为动力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升级为以“场景”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大背景下，社交媒体传播工具实现了从单纯建立人际联结到更加注重情感体验的智能化和视频化转向；“U世代”青年和意见领袖相结合成为参与主体，同时女性在性别鸿沟加剧的逆境中持续发声的努力也更加凸显；舆论场中的民间、官方和国际社会三方呈现出割裂与碰撞并存的局面，而信息战攻防强度升级与平台“武器化”的新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撕裂对立的风险。上述这些已成为社交媒体在当前阿拉伯社会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阿拉伯国家社会治理现状并研判未来运行走向。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都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影响因素。掌握国际传播秩序主导权的西方媒体在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进行报道时，一直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有时将反政府运动人士过度简化和美化，视之为一群单纯、善良而又团结的民主斗士；有时又着力于构建所谓“阿拉伯街头”（Arab Street）这一概念，片面形容阿拉伯世界非理性的、暴力相关的、反美西方的舆论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对该区域的刻板印象和妖魔化形象。虽然有部分原因来自于媒体人和机构的差异，但这种看似矛盾的双向渲染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西方对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持续而全面的意识形态渗透，即在短期不断鼓动当地民众与政府的对立，长期则根本消解阿拉伯人民对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信心。在经济上，西方极力打造所谓“新自由主义神话”，鼓动非西方地区民众不考虑本国发展阶段而支持经济

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西方威逼利诱中东政府放弃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使之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西方积极推销带有自身特色的自由和民主观念与模式，通过改造民主的概念、附加自由主义的框架以及缩限政权合法性的标准，反复干扰和破坏中东国家探寻适合自身政教关系的政治体制的努力。在文化上，西方不放弃实施“人权高于主权”的文化霸权战略，尝试淡化中东国家民众的主权意识，尤其是“文化主权”意识，从而不仅为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开辟道路，也为在必要时直接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提供合法性。^①正是通过大量媒体围绕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议题所设置的话语陷阱，西方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进行了兼具广度和深度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

在当今时代，考虑到本文反复提及的“脸书”“推特”和“优兔”等主流社交产品的国别属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垄断及信息流操纵更是有增无减。“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面向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展开了密集的公共外交攻势，将其视为传统外交、经济杠杆和军事力量之外的解决国际矛盾的第四种途径。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通过对外信息传播系统和国际教育交流体系再造“观念市场”，最终赢得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②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产品的出现，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新闻媒体控制国际话语权的关注，进一步拓展了美国对全球信息流施加影响的渠道空间，成为美国推行其所谓“普世价值”体系的有效工具。目前，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率排名前三位的社交类网站都是由美国公司开发，而逾86个国家和地区周下载量居前三位的社交类手机软件也均来自美国。^③在信息看似自由流动的繁荣景象背后，却是平台高度把控和掌握的信息筛选机制。具体到最近十年两波阿拉伯社会运动中，争议焦点就表现在与美国核心利益和国家意志相违背的信息，能否或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其辐射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充分展示。历史上，以半岛电视台的设立为标志，阿拉伯

^① 唐爱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载《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第49~55页；田文林：《西方对中东的意识形态渗透及其深远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第156~164页。

^② Edward Kaufman, “A Broadcast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2, 2002, pp. 115-127.

^③ 来向武、赵战花：《国际社交媒体传播：基于使用率的信息控制与舆论影响》，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2期，第154~172页。

国家在争取话语自主权方面曾进行过成功实践，为颠覆全球媒介景观下固化的信息“主导性流动”，推动信息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的“互补性流动”甚至“反向性流动”提供了一种可能，不过这种努力在当下更为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中却显得后继乏力、捉襟见肘。所有这些都为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应该意识到必须注意涉及国内公共事务讨论的关键平台的独立性和主导权，加大其建设力度与管理水平，通过掌握舆论情势引导的自主权来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

鉴此，以最近十年的两轮社会运动浪潮为契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确从客观上实现了对阿拉伯社会公众前所未有的赋权作用。我们不仅应该深入地认识阿拉伯世界抗议运动的爆发和组织逻辑，更应该全面理解媒介环境形塑下的公共领域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变动的的影响。数字资本争夺和街头抗议并举的斗争局面，特别是伴随社交媒体“武器化”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复杂心态、政权治理困境和国际利益干扰等，将长期伴随整个阿拉伯世界今后的现代化转型进程。其中，它所蕴含的更多问题，如所谓“第四波民主浪潮”是否会在阿拉伯国家到来、信息茧房和民粹主义的关系、爱国主义和颜色革命的碰撞以及运动示范效应和扩散机制等，仍有待更细致地挖掘。阿拉伯剧变的经验教训业已表明，社会治理失当易导致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通过内外因素的催化最终影响国家的政权和社会稳定。从总体上讲，通过发展和改革提升国家综合治理能力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共识，而社交媒体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帮助国家更快地发现和掌握自身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如今阿拉伯社会运动的许多参与者仍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但与十年前相比，也有不少人开始将更加常态化和非极端化的社会运动视为不断推动国家和社会实质性持久变革的一种方式。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对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而言，如何避免技术工具的进步和细化造成外部势力的持续介入与自身社会的对立乃至撕裂始终是一个难解的挑战。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